

# 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 古书考辨研究

李 燕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 CULTURE PRESS

# 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 古书考辨研究

李燕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 CULTUR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古书考辨研究 / 李燕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075-4765-8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古籍—考证—中国—清代 IV. ①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4582号

## 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古书考辨研究

QINGDAI XUESHU BIANQIAN SHIYEXIA DE GUSHU KAObIAN YANJIU

---

著 者: 李 燕

责任编辑: 刘超平 邹镇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mailto:hwc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65-8

定 价: 40.00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经世实学与清代前期的经书考辨	12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	12
第二节 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	18
第二章 乾嘉考据与清代中期的古书考辨	51
第一节 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向	51
第二节 乾嘉学者的《古文尚书》考辨	55
第三节 钱大昕的史书考辨	69
第四节 崔述与《考信录》	74
第三章 今文经运动与清代后期的古书考辨	90
第一节 今文经运动与以“义”考经的兴起	90
第二节 龚自珍的古书考辨	94
第三节 康有为与“两《考》”	103
第四章 关于清代古书考辨的认识与评价	117
第一节 清代古书考辨的思想特点	117
第二节 对清代古书考辨方法的若干分析	127
第三节 对清代古书考辨与学术变迁的若干认识	145

## 2 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古书考辨研究

结 语·····	154
附录一 《尚书古文疏证》成书考略·····	158
附录二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163
参考文献·····	174

## 绪论

古书考辨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sup>①</sup>，姚际恒将辨别古籍真伪视为“读书第一义”<sup>②</sup>。梁启超也指出，“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sup>③</sup>清代学者对于古书的考辨由经及史又转而考及诸子，并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疑古与复古的并行不悖，疑经与尊经的对立统一，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它反映出古书考辨与清代学术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后世的学术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清代古书考辨不仅具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

① 传统观点一般以“古书辨伪”来概括学者考辨古书真伪的工作，如孙钦善指出：“辨伪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把关于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包括在内。”见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既然如此，则古书考辨应当包括“证真”和“辨伪”两方面的研究，仅以“辨伪”概括之，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古人的考辨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辨伪古书，还包括对古书的证真。清代的古书考辨无论是辨伪还是证真都与考证密不可分。郑良树指出：“古籍辨伪学所研究的应该是古籍的作者、成书时代及附益等三方面的课题，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来鉴定古籍的真和伪。所谓真，是指古籍与作者或成书时代相符；所谓伪，是指其传闻者和它确实的作者、成书时代相乖，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古籍辨伪学实际上应该包含来往的两条研究路线，不但要研究‘真’书，也要考订‘伪’书，是一门‘真到伪’‘伪到真’双轨同时进行的学问。”见郑良树：《古籍辨伪学·自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页。职是之故，本文采用“考辨”这一概念指代清代学者对古书辨伪与证真的学术实践，在研究对象上以清人对古书的考辨为主，旁及古史。

②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古籍考辨丛刊》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总第273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82页。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清代学术始于考经，理论思维及学术取向的转变，带来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清初摒弃宋明理学，倡导实证考辨，由重义理过渡到重考证，经书考辨也被纳入研究领域。清初学者的考辨重点集中在《书》《易》《大学》等经书上，顾炎武《日知录》、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同《群书疑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著作都涉及或专主对群经的考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陈确《大学辨》等是考辨专经的代表作。围绕《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展开论战，遂成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实际上，阎若璩、胡渭等人的经书考辨并不是孤立的，它产生于宋明理学向清代学术转变的时期，具有鲜明的思想史意义。清初学者的考辨工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sup>①</sup>。

乾嘉时期，惠栋、戴震等学者尊崇汉儒经说，强调由小学入手寻求经典大义，考据学风大盛。在系统整理和全面总结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学者们继续对《尚书》等经书进行考辨，出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戴震《经考》、王鸣盛《尚书后案》、丁晏《尚书余论》等著作。同时，他们还将考辨范围扩大到史学领域，如钱大昕对于《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的考辨，钱大昭对于《汉书》《后汉书》的辨疑。崔述的《考信录》是这一时期考辨古书、古史的集大成之作。古书考辨更加具体化、实证化，促进了校勘、音韵、训诂、目录、辑佚之学的发展。

---

<sup>①</sup> 关于清代学术的概念，学界从治学宗旨、学术风格、治学方法等不同角度予以界定，提出了汉学、朴学、考据学、实学等各种名异实同的称谓。学者所言乾嘉考据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乾嘉考据学是相对宋明义理之学而言的清代学术的总称，狭义的乾嘉考据学则指乾隆元年（1736）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间的学术。敖光旭对此有系统梳理，详参敖光旭：《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第76—85页。实际上，清代学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多数学者都承认，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强调经世致用，形成了博大恢宏的学术风格。考据学虽然在17世纪中期已见端倪，但直到18世纪才占据清代学术的主流，清代学术还包括义理之学、经世之学等学术思潮。详见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9—124页。乾嘉年间的考据学虽然是清中叶学术的主体，但不足以囊括整个清代学术，而其本身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职是之故，本文所说乾嘉考据学仅就其狭义层面的意义而言。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随着社会和时局的变化,清代学界兴起了今文经运动,疑古的精神再次高涨。这一时期,考辨古书的著作主要有皮锡瑞《五经通论》、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龚自珍《六经正名》、魏源《诗古微》及《书古微》、廖平《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在考辨过程中,学者们对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的子书也日趋重视,使得诸子学逐渐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清代的古书考辨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梁启超、胡适等人对此都有相关论述。肇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运动后来发展为对古书、古史的系统考辨,究其思想根源,不能不追溯到传统疑辨思想尤其是清代的辨伪学上。可以说,研究清代的古书考辨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书传流规律,完善考辨理论方法,思考历史考证的客观性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古书考辨还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也备受尊崇,这一局面直至 20 世纪初叶才逐渐被打破。自孟子建立一套经典诠释的原则和方法以来,历代通过传、笺、注、疏等形式给予经典以价值或历史的不同诠释,使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学术形态。从两汉经学至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考据学,率皆如此。与经典诠释相伴而生的,则是人们对于经典及其传注的考辨研究。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书考辨在受学术发展规律制约的同时,也对学术发展具有反作用力,并进而对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关于清代辨伪学的论著已有很多,但以往的研究多是从辨伪学史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对具体考辨方法的梳理和分析,而结合相关社会和学术思想背景分析清代古书考辨,并系统考察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此外,近年来地下简帛文献的大量刊布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讯,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思考古书成书、传流等问题,并对传统辨伪学的得失加以反思。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学术变迁的视角出发,对清代古书考辨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总结清代学人的考辨实践及其特点,探讨古书考辨与学术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其历史意义与价值提供借鉴。在

时间断限上,本书主要涉及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后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前共260余年的历史。就研究意义而言,本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古书考辨考察清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对于进一步深化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清初阎若璩、胡渭等学者致力于经书考辨,促进了考据学的兴起。受考据学范式的制约,乾嘉学者的考辨范围由经及史,更加具体化、实证化。清代后期,今文经运动兴起后,考辨重点转移到以《春秋》为代表的经书,子书也被纳入考辨范围。清代学术的变迁,框定了古书考辨的范围和领域。通过清代的古书考辨,可以一窥清代学术变迁的风貌;而清代古书考辨对象及其宗旨、方法,也对清代学术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将清代古书考辨置于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下加以考察,通过分析具体事例,探究古书考辨与学术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进一步深化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通过分析清代学人考辨的思想内容及方法特点,将对客观认识辨伪学史及开展相关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清代古书考辨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在此基础上,清儒在考辨古书的实践中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中阎若璩创建的“根柢一枝节”考辨原则更具有方法论上的典范意义,并影响了后来学者的考辨实践。历史地考察清代学者的具体考辨过程,并通过与宋明学者考辨实践的比照,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分析其考辨特点,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历代辨伪学史的发展脉络,这对客观认识辨伪学史以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考察清代学人的古书考辨实践,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文献学的研究。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刊布,使得传世典籍的产生和流传情况更加丰富、立体,并为研究古书考辨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也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文献学研究进行反思。因此,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通过分析清儒的考辨原则与方法,检视清人考辨古书的得失,有助于动态地认识古书成书与传流规律等问题,这对传统文献学的发展不无裨益。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关于清代的古书考辨，学界以往多从辨伪学的角度予以考察。早在清代，皮锡瑞《古文尚书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就曾针对阎若璩、毛奇龄的论证进行评述<sup>①</sup>。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清人的辨伪方法概括为六条：从著录传授上检查，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sup>②</sup>此后，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对辨伪方法做了进一步归纳。胡适将审定真伪的证据归纳为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种<sup>③</sup>，认为清人的考据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大胆的假设”，二是“小心的求证”<sup>④</sup>。

20世纪前半期，在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出现了考辨古书、古史的热潮。顾颉刚撰有《中国辨伪史略》<sup>⑤</sup>，并与其他学者点校出版了《古籍考辨丛刊》《崔东壁遗书》<sup>⑥</sup>，其中都涉及对刘逢禄、崔述等清人考辨方法的评析。受此影响，张心澂《伪书通考》论述了辨伪意义、伪书分类、作伪原因、辨伪方法等问题<sup>⑦</sup>，并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爬梳历代辨伪资料。这一时期，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周官著作时代考》等文章中<sup>⑧</sup>，系统批驳了康有为等公羊家的“刘歆遍伪群经”说。余嘉锡著《古书通例》从著录、体例、编次、附益四方面阐述了古书著作体例，并对姚际恒等清人的辨伪观点加以评

① 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53—548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85—387页。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0—22页。

④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上）第2集，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43页。

⑤ 顾颉刚撰，王煦华导读：《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中国辨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⑥ 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1），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⑦ 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

⑧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析。<sup>①</sup>王国维则将传统乾嘉考据方法同近代实证主义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献文物相印证的方法考辨古书古史真伪。

此后,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sup>②</sup>,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上中下)、《中国古文献学史》(上下)<sup>③</sup>,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sup>④</sup>,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等著述也从不同角度涉及清代的古书考辨<sup>⑤</sup>。

随着研究的深入,针对专书、专人展开个案研究的著作逐渐增多。继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陈梦家《尚书通论》、蒋善国《尚书综述》后<sup>⑥</sup>,学界证真《古文尚书》的著述逐渐出现,如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从文献流传、史地、史实、历法、制度、引文六方面驳斥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观点,并从无罪推定与大胆假设角度质疑辨伪学的合法性<sup>⑦</sup>。杨善群在《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等文章中<sup>⑧</sup>,也从《尚书》流传与文句引用等方面反驳阎若璩的观点。

此外,学者们还从方法论的层面分析阎若璩、胡渭、崔述等人的考辨实践,如许华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辨伪方法》、魏慈德《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韦勇强《崔述古史考辨理论及方法浅谈》、罗炳良《崔述历

---

① 余嘉锡:《古书通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上中下),《文献》,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2期;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④ 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 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

⑥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⑦ 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⑧ 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第119—123页;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第9—12页。

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等论文<sup>①</sup>。钱大昕、戴震、章学诚等学者的考辨思想也逐渐受到关注,如张涛《钱大昕的史籍辨伪》、徐道彬《戴震辨伪成就述论》、朱梅光《章学诚辨伪学成就初探》等<sup>②</sup>。苏庆彬《阎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伪方法之研究》、傅兆宽《明梅鹗、清阎若璩二家辨伪方法之研究》等文章对相关学者的辨伪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sup>③</sup>。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刊布,为研究清代古书考辨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郑良树《古籍辨伪学》《诸子著作年代考》<sup>④</sup>,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sup>⑤</sup>,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sup>⑥</sup>等著作在结合简帛文献分析传统辨伪学时,都对清人的考辨方法有所分析。廖名春通过比较今本《尚书》与郭店楚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相关篇章,认为今传《古文尚书》25篇“确非先秦之旧,为后人所编造”。<sup>⑦</sup>刘笑敢《老子古今》(上下)、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等论著<sup>⑧</sup>,都在比勘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过程中,结合清人考辨结论对古书流传问题加以探讨。

① 许华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辨伪方法》,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21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魏慈德:《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东吴中文学报》,1999年第5期,第1—25页;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第50—52页;韦勇强:《崔述古史考辨理论及方法浅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第62—65页;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4页。

② 张涛:《钱大昕的史籍辨伪》,《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71—76页;徐道彬:《戴震辨伪成就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第77—80页;朱梅光:《章学诚辨伪学成就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81—183页。

③ 苏庆彬:《阎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伪方法之研究》,《新亚书院学术研究年刊》,1961年第3期,第1—63页;傅兆宽:《明梅鹗、清阎若璩二家辨伪方法之研究》,《华冈文科学报》,1988年第16期,第133—174页。

④ 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⑤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⑥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⑦ 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第119—123页。

⑧ 刘笑敢:《老子古今》(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第5—15页。

相比之下,结合学术变迁探讨清代古书考辨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曾谈及清儒考辨古书的思想背景<sup>①</sup>,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分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考察了清代汉学变迁的四个时期。<sup>②</sup>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sup>③</sup>,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sup>④</sup>,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sup>⑤</sup>等著作开始在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下考察清儒的古书考辨。

此后,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从汉、宋传统竞争回归原典的角度出发,对历代考辨易图、《古文尚书》、《诗传》、《诗说》、《周礼》、《大学》、《中庸》等问题进行评析。<sup>⑥</sup>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指出,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是反陆、王的,陈确、毛奇龄的考证则是反程、朱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了理学传统中程、朱和陆、王的对垒”。<sup>⑦</sup>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以疑古思潮发展史为线索,从汉宋学风转换的角度出发,分章研究了疑古思潮下的清代古书考辨。<sup>⑧</sup>张京华等著《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也对清代疑古思潮进行了简要评析。<sup>⑨</sup>高翔在《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中,以理学和汉学两大主流学术为核心,着眼于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下论述了清人的古书考辨。他认为,从观念变革的角度看,阎若璩的考据成就只是开创了以实证方法重新审视儒家经典的风气,学界比较全面剥除儒家经典神圣外衣,真正将经文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②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1—273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⑤ 朱维铮编,周予同著:《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⑥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⑦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49页。

⑧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 张京华等:《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作为学术问题予以研究这一历史性学术进步,是由袁枚、崔述等人逐渐完成的。<sup>①</sup>汪学群《清初易学》分析了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易学考辨,并专章讨论了毛奇龄、胡渭、李塉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sup>②</sup>

在个案研究方面,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始终是近现代学者们的关注焦点,相关著述主要有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容肇祖《阎若璩的考证学》、林登昱《〈尚书〉学在古史辨思潮中的新发展》等<sup>③</sup>。胡适认为,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十六字心传”出于道经,是对“危微精一”之学“放了一枝很厉害的暗箭”。<sup>④</sup>刘人鹏《阎若璩与〈古文尚书〉辨伪——一个学术史的个案研究》提出,今古文《尚书》考辨问题表明一种历史知识的建立或接受,与其他相关信念或知识或价值观是互动的;辨真派与辨伪派的论战,反映了阎若璩的考证形态对当时的冲击;考证学风的弥漫,早在清初已然;考证学既不是理学的反动,也不是理学内在生命的开展。<sup>⑤</sup>吴通福《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则围绕清代《尚书》考辨问题,指出清初经典考辨的义理关怀,“与其说是辨别理学与心学之孰是孰非以及谁更可以在经典中找到依据,毋宁说是其意更在于证明理学之经典诠释之错谬”<sup>⑥</sup>。

在专人、专书研究方面,邵东方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从崔述的考辨实际入手,通过挖掘崔述学术内部的深层矛盾来展示它在学术史中的运动轨迹。<sup>⑦</sup>史振卿的《清代〈尚书〉学若干问题研究》,将清代《尚书》学演变与学术思想变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清人对《尚书》的辑佚和历代

① 详参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三章“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8—424页。

② 详参汪学群:《清初易学》第三、六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4—380、601—662页。

③ 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3年;容肇祖:《阎若璩的考证学》,《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615—638页;林登昱:《〈尚书〉学在古史辨思潮中的新发展》,嘉义: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87年。

④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98页。

⑤ 刘人鹏:《阎若璩与〈古文尚书〉辨伪——一个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⑥ 吴通福:《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⑦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经解汇编反映出这一时代儒学的基本走向，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sup>①</sup>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清代以来的考辨成果，结合相关简帛文献，对古书成书与传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李锐以《尚书》《墨子》为中心，梳理了古史辨时期、走出疑古时期的古籍年代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指出对于古书形成年代，“不当问全文全书的早晚，而是要辨文字和辨‘主体部分’或‘主题思想’”；故事、思想、言论由于记载、引用、篇章别行，乃至前后期写作不同，口传到记录的历时差异，复述时的舛舛，而形成了构成故事情节的诸多彼此主题思想、主体内容相似的“族本”系统。“族本”之下，每个文本成为此一流传系统的“祖本”，每个系统之下则是同源异流的文本流传系统。<sup>②</sup>

就目前资料所及，学界对学术思潮背景下的疑经研究较多集中在宋代，如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等<sup>③</sup>，而从学术变迁的视角专门探讨清代古书考辨的成果则仍显不足。上述成果的问世，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三、研究方法 with 基本构架

本书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线索和逻辑线索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以人物为专题，分清前期（顺治至雍正时期）、乾嘉（乾隆、嘉庆时期）、清后期（道光至宣统时期）三个阶段考察清代学术变迁视野下的古书考辨。通过分析清代不同阶段的古书考辨实践及其具体表现，探究古书考辨与清代学术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结合出土文献思考清代古书考辨特点、影响及得失等问题。

---

① 史振卿：《清代〈尚书〉学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李锐：《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第141—154页。

③ 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运用如下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爬梳清代学者古书考辨的基本史料，整理分析学界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中了解清代古书考辨的概貌及学界研究动态。

二是个案研究法。通过对清前期、乾嘉、清后期三阶段的专人、专书进行个案分析，考察清代古书考辨的学术实践，以揭示不同阶段的学者治学取向及其特点。

三是跨学科研究法。本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学、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将关照清代古书考辨在不同学科中的位置与意义，力求从多角度深入认识这一研究对象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复杂关系。

此外，本书还将从实际出发，尝试借鉴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理念、方法开展研究，如在考察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时，本书将结合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概念加以诠释。囿于学力及时间，书稿在写作中不免挂一漏万、难顾周全，其中许多问题未能展开论述，只能俟诸来日继续完善。书中不当之处，尚祈各位方家教正！

## 第一章 经世实学与清代前期的经书考辨

清初学术始于考经，实为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sup>①</sup>明代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在大行天下的同时，也逐渐生出诸多流弊，特别是王门后学中泰州学派标新立异、蔑视礼法的行径，更对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严重挑战，并导致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现象的出现。对此，一些东林复社士人积极倡导纠正王学的空疏学风，讲求学以致用。与此同时，刘宗周、孙奇峰、黄宗羲等王门后儒也注意反思，并调和朱陆、崇实尊经。

然而，明清鼎革，风云变幻。顾炎武等学者在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人生展开深入思考，并希望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原始大义。为此，他们直承明代中期以来的考证学风，远绍唐宋疑经思想，通过考辨《易》《书》等经典，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与修正。在经世思潮的影响下，清初学界由纠偏宋明理学而折入经书考辨，从而开启了乾嘉考据之学的大门。

###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

明清之际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其代表人物密切关注社会，并身体力行倡导实学，希望借此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理学内部的自我调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引发清初理学到

---

<sup>①</sup>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因，学界大致存在“外缘因素说”和“内在理路说”两类观点。前者如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提出的“文字狱高压”说，侯外庐先生的“早期启蒙说”；后者以钱穆、余英时等学者为代表，认为清代学术承自宋明理学。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是众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蒋秋华将其归纳为两大方面、三个要素。详参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第22—23页。